

先锋批评文丛

郜元宝 著

在失败中自觉 WAKING UP TO FAILURE

思想的合理运动的方向，
总是通过否定自身的局限
来肯定它和某个超越自身的存在的联系，
而道德的合理运动的方向，
则是通过肯定甚至美化自身的局限
来达到对某个对象性存在的否定。
思想总是冒险地指向思想之外，
道德总是无限柔情地封闭于自我，
一再重复对自我的抚慰。

在失败中自觉

Waking Up to Failure

郜元宝



先锋批评文丛

思想的合理运动的方向，
总是通过否定自身的局限
来肯定它和某个超越自身的存在的联系，
而道德的合理运动的方向，
则是通过肯定甚至美化自身的局限
来达到对某个对象性存在的否定。
思想总是冒险地指向思想之外，
道德总是无限柔情地封闭于自我，
一再重复对自我的抚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失败中自觉/郜元宝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朗朗书房·先锋批评文丛)

ISBN 7-300-05482-X/G·1054

I.在…

II.郜…

III.社会科学—文集

IV.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2895 号


先锋批评文丛
在失败中自觉
郜元宝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 - 62511242(总编室)	010 - 62511239(出版部)	
	010 - 82501766(邮购部)	010 - 62514148(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965 × 1270 毫米 1/32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11.125 插页 2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97 000	定 价	22.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在失败中自觉

——自序

一、在失败中学习与学习失败

这篇文章是一次尝试,我想现身说法,从自己的求学经历谈起,希望能够触到当代思想学术的一些方面。高明者自然可以不屑一顾,但如果愿意一顾甚至仿效者,则更是我乐意看到的。

我于20世纪80年代初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那时候现当代文学研究很热,被这股风气推动着,尤其受班主任陈思和先生的影响,从1986年开始,我就悄悄学习写点评论性文字了。

最早发表的一篇评梁晓声的习作,本来是选修潘旭澜先生“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的作业。潘先生用铅笔在上面写了一些鼓励的话,后来就由陈思和先生介绍发表在陈言先生主编的《当代作家评论》上。那时候觉得当代文学批评只要有对当代生活的切实感受就行了,无需多少“理论准备”。我一开始写评论,主要是借作家作品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或者仅仅抒发自己对当代生活的想像而已。对一个处在富于想像和幻想年龄的青年学生来说,所谓文学批评,首先是把自己心里莫名的感动写出来,既不是批评,更不是批判——当我在人头攒动的教室里铺开稿纸急不可耐地奋笔疾书时,没有批评的能力,也没有批评的意识,很接近超现实主义所谓的“自动写作”。那时最爱读俄国短命的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

(也许就因其短命和才华横溢而令我生出格外的同情与好奇罢),周围也有不少同学喜欢读他的书,记得有个立志做评论现在却是一名不错的股评专家的同学,受“波夫君”影响,写起文章来不停地用破折号,一句话可以写上一页纸也不需要换气。杜的评论特别注重来自生活体验的直接发现,爽快,清澈,有气势,很少看到什么特别的“理论准备”,更谈不上如今批评文章流行的那种旁征博引了。这一点让我特别感到自信(我同时忽略了杜勃罗留波夫在才华横溢的文字背后清醒的现实批判精神),觉得文学评论的门槛不高,只要像“波夫君”那样忠实于生活,那样善于体贴作家,那样生动而丰满地描述自己的阅读感受,就足够了。

好景不长,这样的“自动写作”很快就难以为继,因为那时也开始了对理论的兴趣,学习理论的兴趣在暗中限制着甚至嘲笑着自由抒发式的评论——但我也只是从此感到笔头的滞涩,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二者之间的矛盾。

一个喜欢自由抒写的人如何在不知不觉中滑入理论的泥坑,从此开始他仰望西方永无止境的理论学习的生涯,现在看来,恐怕已不能仅仅归结为80年代那种群众性的理论热。“五四”以来我们这个民族在整体上就有一种学习西方理论的不懈追求,跟这个整体性的理论信仰比起来,一个中文系学生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之外始终敬畏纯粹的理论,虽然矛盾,却也很自然:一种名叫“学习”的绝对命令抓住了他的中枢神经。“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鲁迅这句口气古怪的名言所说的“学习”,不也有一种绝对的不容分辩和压倒一切的气势吗?可见在绝对正确的批评精神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学习”的命令。从似乎可以自主的自由抒写开始,而以终身苦役般的学习告终,这也许是现代中国大部分能文之士的运思轨迹吧。

本科毕业前后,我报考硕士研究生。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王元化先生,他在华东师大中文系招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生,二是本系王运熙教授,也是治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名家。后来还是决定考本校,但很不巧,王

运熙先生那年正好“轮空”，不招研究生，这才临时改读“文艺理论”，当时好像认为这两门专业同样强调文学研究中的理论性和思辨性，都符合我的理论学习的倾向。

然后当然是整天坐在图书馆里乱翻一气，恨不得一天读完十几本书，但最感兴趣的还是叙事学理论，这也是当时理论界的一个热点。浙江的批评家李庆西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上海文学》上，题目叫《小说的嬗变》，他认为80年代中期小说的变革主要是叙事观念和叙事方法上的革命，这对我启发很大。不久，陈平原发表了专门研究近现代之交中国小说叙述模式变迁的学位论文，算是把这方面的研究推向了高潮。我当时看了不少叙事学方面的书，比如法国的罗兰·巴特、格雷马斯、热·热纳特和美国的韦恩·布斯等，还翻译了德国接受美学专家沃尔夫冈·伊塞尔的《读者在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作用——论〈名利场〉》，并套用这个理论分析过“王蒙小说的读者意识”。当时写的一些评论文章也很有一些叙事学的色彩——生搬硬套者居多。我对苏联文艺理论家波斯彼洛夫在《文学原理》中提出的“实感世界”的概念也很有兴趣：他认为作家在创造了一个鲜活的“实感世界”的同时，也在那上面保留了创作的痕迹，即可以分析乃至还原出来的一整套叙事方法和结构模式，二者的关系，好比刚刚竣工的大厦和还没有来得及拆除的脚手架。受他启发，我把叙事学理论跟5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界流行的人物、主题和情节结构分析方法糅合起来，试图弄出一个自己的框架来——那时大家都想建立体系嘛！这方面我还有一个模仿对象，就是余英时先生讨论《红楼梦》“两个世界”的文章，他认为《红楼梦》作者把大观园的现实世界和以太虚幻境为中心的虚拟的神话世界叠加，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哲学，我觉得这和波斯彼洛夫的理论正好相互印证，再加上我当时对小说文体风格也比较重视，认为这是任何小说在“实感世界”和“叙事模式”之外必不可少的第三要素，而且这三要素之间还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我把这种思考综合起来，在导师应必诚先生帮助下，很快凑成了硕士学位论文：《论小说的“实感世界”、“叙事模式”和“文

体风格”的三位一体》。上述文章,后来都收在第一本评论集《拯救大地》中。

但我慢慢发现,学到的一鳞半爪的理论跟自己密切关注的正在不断展开的当代文学之间始终格格不入。这使我很困惑。不断涌入的各种理论和就在我眼前展开的当代文学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我越来越心中无数。文章一篇接一篇地写出来了,这种疑惑还是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根本无法解决。

这是我最初在学习体验到的失败感。我想用学到的理论来解释当代文学,但是失败了。我想也许只是我一个人失败了,别人则是成功的,但今天似乎可以大胆地说:在运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当代文学时,大家都失败了。这种“失败”应该是作为学习者的我们最切身的经验,如果正视它,便可以从中引出一些有价值的思考;不去正视,就真的毫无价值了。

但这是后来的想法,当时只觉得我的失败仅仅因为理论修养不够,“更上一层楼”,也许就不同了。因此,在继续写零零碎碎的评论文章的同时,我免试直读了文艺学博士研究生,想在理论上继续摸索下去。由于当时认为自己的欠缺主要是更多更好的西方文艺美学理论,所以博士阶段学的是文艺学专业西方美学方向,又因为导师蒋孔阳先生通常指导学生研究某一位西方美学史上的名家,所以我的兴趣慢慢就集中在海德格尔身上——这也是当时理论界的一个热点。我选择海德格尔做题目,盲目性和不自量力可想而知。当时无非出于一种幼稚心理,认为叙事学理论太狭隘,无法和存在主义思潮鼻祖海德格尔相比,读懂了他的著作,岂不是抢占了制高点,可以顺流而下,势如破竹了?

但这就再次把自己放进了典型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困境里,即一相情愿地认为只要掌握一种来自西方的最好学问,就可以抵达中国问题的核心。从1989年到1992年那三年,我通过英文一门心思硬啃海德格尔的书,摘译了一些段落,便是后来《海德格尔语要》的雏形。当时只是为了替博士论文《海德格尔美学思想》做准备,并没打算大规模地翻译,而且翻译

对我来说也实在太难了。有些朋友知道我的专业方向,就以为我的外语一定很好,其实不然。德语学了一年,早就原封不动归还给老师了,英语虽然从初中就开始学,但可能没这方面的天才,到某个水平就一直没法提高了,真是“文法也未必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结果只好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了。

更主要的困难,还来自我当时所委身的流行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海德格尔之间的格格不入。这种深深的抵触,令我的理论学习陷入根本的失败甚至荒谬。比如,博士论文的题目就不通:海德格尔是反美学的,因为他思想的核心是反西方形而上学哲学,重新梳理西方哲学史传统,美学恰恰是形而上学哲学解释艺术的方法,也是他要反对的,而我居然认为海德格尔有他的美学!

海德格尔主张要不断地松动传统所造成的僵化,以此敞开自己的思想。这是一个不断追问的过程,“追问是思的虔诚”,先有一个结论的思想则是不虔诚的。按他的说法,思被一种东西召唤着,思不属于思想者本人(主体),思是属于存在并向着存在的一种运动。思应当思那最值得一思的东西,而这最值得一思的东西又总喜欢离人远去,思于是就被这个东西牵引着——这种思,就大大地不同于主体以其思维能力占有和征服世界的那种意义上的哲学,而是人这个存在者对存在的召唤做出回应,听任存在的呼声由远及近将自己攫获。所以海德格尔乃是最谦虚的思想者,虽然表面上显得强悍。这种谦虚一方面导致他对西方哲学传统的解构,同时也帮助他在自己的思想中调整人和现实、人和传统、人和语言的关系,把人的写作、思考与行动都建立在存在论基础上——顺应、谦卑的生存,而非人道主义的征服。海德格尔的思想是反人道主义——准确地说是“非”人道主义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则是人道主义的。海德格尔曾经这样描述他与萨特的区别:萨特是一个其上只有人的平面的人道主义者,而他认为人仅仅是一个其上只有“在”的平面的一个“在者”。海德格尔试图以此打消人道主义哲学所鼓励的主体的人的狂妄和自我封闭。

这是我后来所理解的海德格尔思想的主旨,那时候却被80年代流行的主体论哲学和人道主义思潮所吸引,正好陷入了海德格尔霍喊人们从中解放自己的那种狂妄与狭隘。这确实滑稽:当我口口声声力图忠实地复述海德格尔时,却并没有把这些东西上升到自觉意识的高度;在自觉意识层面,我仍然被最没有海德格尔气的那种学术时髦和思想潮流裹挟着——这在知识界最好的表达就是始于80年代、极盛而衰于90年代上半期的“人文精神”——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哲学表述。

这样一来,我的学生阶段的求学就不能不陷入又一次失败:我对自己正在潜心研究的存在论思想有很大的隔膜,而上述和存在论思想正好相反的“人文精神”却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轻易地把我俘虏了。一个海德格尔研究者在思想观念上却是“人文精神”的学生,这样的“学习”当然只能是南辕北辙。

.....

困扰我的问题是:我们的思想始终跟某种“学习”的姿态、“学习”的过程,特别是这种“学习”几乎注定的“失败”联系在一起;对“五四”以后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宿命般的“学习”和“失败”才是惟一具有统一性和恒久性的“我们的现代性”。“学习”是我们思想学术中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是作为一个“学习者”开始思想的——我说的“学习”有其特定含义,它和某种“失败论”联系在一起。具体说来,无论“五四”还是80年代,我们在开始思考之前就已经不得不承认自己“失败”了,我们没有一套完整合用的学术传统来解释当下的文学与现实,我们一无所有,在精神上是乞丐,每走一步都必须以乞丐般狼吞虎咽的“学习”为前提,这就决定了在现代中国包括我们这一代在内的一大批学者——我甚至想说绝大多数学者——思想上永远不会、也不可能“成熟”。我们往往从“失败”开始,通过一生的“学习”而以“失败”告终。

冯至先生在80年代有一首诗,说他30年代否定了他的20年代,40年代否定了他的20年代和30年代,50年代否定了解放前的所有作品,到了

80年代又把一生都否定了。这首诗虽有些调侃,但诗人在每个年代都经历自我否定却非常真实。自我的否定,也是从不断的“学习”得来的经验。“学习”,对一个中国人来说不是学习建构自我,而是学习如何面对自己的“失败”。“学而时习之”,对我们来说就是失败了学习,学习了再失败。

不过,在失败中学习和学习失败,总比忘记自己是一个学习者和失败者好得多。别林斯基说:“高贵的贫乏比幻想的富有好些!”他还说:“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学习!学习!学习!请告诉我,看上帝的分上,一个一知半解的孩子,纵然天赋着智力、感觉和才能,在我们的时代是不是还能吸引人的注意?”别林斯基是在完全否定俄国文学之后说这番话的,也就是说,在完全承认到他为止的俄国文学的失败之后重新乞灵于学习。最近又一次读到《文学的幻想》里的这段话,真觉得好像就是为我们预备的一样。

在中国——大而言之,在整个东亚知识分子身上——都有一种“被动现代化”的特征。胡风在40年代曾经把这个“被动现代化”概括为后进对先进的“追赶”,在思想、话语上则表现为“坐在概念的飞机上抢夺思想竞赛的锦标”。多么传神!但胡风仅仅指责那些变化无常、因为现实考虑而朝秦暮楚的学者、批评家和作家们,我想把他这个漂亮的概括上升为一种客观性的全景把握。西方真正有成就的思想家的思想总是在和一个有序的传统对话中展开,他成名时思想基本已经成型了,他可以一辈子坚守和阐发自己的思想。在现代中国这种情况却绝难一见;在现代中国,变化是常态,不变是变态,除非你已经成为一个思想僵化的保守主义者,很早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我在前几年写的一篇谈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分期”的文章中所要阐发的,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这种“未完成性”。最近几年我研究鲁迅时更强烈地感觉到现代中国作家都是“未完成的”。鲁迅是“未完成的”,别的作家都是“未完成的”。这里也许可以用得着马修·阿诺德在《现时代批评的功能》中批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时所用的那个概念,

“Premature(“早熟”、“不成熟”)”,来形容我所说的“不完成”或“未完成”。8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一大批作家和中年学者们都急于把自己的思想变成一个完成,急于告别“未完成性”,我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要告别“被现代化”的不断学习又不断失败的命运,在迁流不息的学术潮流中立足,站稳,甚至开山立派。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今天仍然处在而且越来越陷入了“学习—失败—再学习—再失败”的命运中。“学习”使我们愁容满面,姿态难看,使我们经常怀疑自己,使我们越学越惶惑,而不是相反。从80年代走过来的人都有这个感觉:我们不断地在否定自己,有时候是自己否定自己,有时候是客观情势使我们不得不如此,我们因此全都无法坚守某个稳定的对世界的看法。很多人认为这是卑怯,是不可原谅的思想混乱,是缺乏定力与操守,所以竭力要把它掩盖起来,我现在倒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拼命掩盖由学习和失败的循环导致的虚弱和虚空,恰恰是思想上极不真诚的表现。

实际上,中国知识分子不仅要承认自己的“不完成性”、“被现代性”,还要进一步承认自己命运般的“失败”,还要带着失败的耻辱和创痛,亲自挖掘这个失败的意义,把它当做自己惟一合法的资源来“占有”。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触到了鲁迅思想和文学的核心。鲁迅一开始也不情愿“失败”,他甚至以表面上承认失败和指责别人不肯承认失败的方式来维持自尊与自信,但至少在进一步反思自我的20年代中期(《野草》时期),他终于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不肯承认失败的心态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障碍,是中国人的思想走向健全的最大阻力——简单地讲,这种障碍和阻力,便是我们好像很熟悉、好像很懂得,事实上却一直在回避着的“阿Q精神”。阿Q精神仍然值得深究——当然我这里也把所谓的阿Q精神普遍化了。

当我的第一本评论集《拯救大地》快要出版时,随手写下的“后记”,翻来覆去总离不开标题所谓“匮乏的年代,无力的言辞”这两句话,它们和书名的张扬自信竟有天壤之隔。是的,我们一直都在“匮乏”,都在“无力”,

都在“失败”。“失败”是常态,什么时候结束,无人知晓;承认失败才会有转机,但反败为胜的转机何时到来,也无人能够断言。

在这意义上,我觉得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深深地抵达“五四”精神,当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似乎离“五四”精神越来越远了。鲁迅对“阿Q精神”的把握,周作人提倡“知耻”,我们可能都还没有很深的领会,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急于把自己变成某种颇为强大的传统的传人、某种绝对正确的价值观念的发现者和维护者。中国知识分子因为对自己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处境和命运缺乏了解,往往盲目自信,不肯“虚心”。我觉得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那些占据主流地位的作家学者不“虚心”。当然这个“虚心”是和我对中国现代思想的上述思考联系在一起的;我不是说他们缺乏一般的虚心。作家学者们在某些场合、某些领域、对某个具体问题尽可以很虚心,但他们对自己根本的思想处境,对自己思想的“未完成性”,对自己必须终生陷入其中的“学习/失败”——没完没了的过程——并无充分的自觉和由此而来的“虚心”。

我们文化的“他者”,很多西方学者,也发现了相似的问题。“学习”的概念,我就是从海德格尔那里了解到的。只有虚心地学习,才能保持思想上的敞开状态,才谈得上中国跟世界对话,才能建立知识分子和现实的健康联系。否则自以为真理在握,必丢掉“学习者”的本分,片面地离开命定的轨道,落入绝对虚妄的存在。

有些人之所以不肯敞开自己的学习过程,我想主要因为在他们看来,既然“学习”是一个不断被超越的过程,那么就没有价值,就不值得去说去反省;他们追求的是当下最好的东西,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应该是学习的结果而不是学习过程本身。他们对自己的思想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改变的实际情形不愿正视,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学习过程比学习的结果更重要。应付具体的学术问题,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非常接近,他也要寻找一个最佳答案。但和自然科学家不同,人文学者还更加应该“占有”自己“学习”的历史,他应该从自己的学习的历史中认识自己。解答某

一现实问题时,不断的自我否定的学习过程可以被省略,但长远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经验,恰恰应该在正视自我的意义上认识这种典型的中国经验。

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发现自身内部的、跟自己最靠近的中国思想的典型经验,就永远难以找到自己思想的源头——我认为这个源头就是我们当下不断的“学习”和不断的“失败”,就是刚才讲到的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倡导的“知耻”,以及鲁迅对阿Q精神的持续反省。

在失败中学习和学习失败,也许正是中国现代性隐秘的源头。知识性的东西是次要的,我们可以学萨特,学海德格尔,学罗兰·巴特,学德里达,学拉康,学后历史主义,学后结构主义,学后殖民主义,学女权主义,这都是“知识”,“知识”本身并不能直接成为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的形成是在我们开始对这些知识的学习之后。我们在“学习”知识过程中不断遭遇“失败”,不断改变自己,由此获得一种反省和自觉,慢慢建立自己的“经验”。用鲁迅的话讲,就是盗西方的火,火并非目的,目的是要拿它“煮自己的肉”,在他人的烤炙和自己的煎熬中认清自己。

“学习”的过程,“失败”的过程,应该被我们重新发现,应该由我们把它当做自己惟一的真实经验来占有。你说这是“中国经验”也好,“我们身边的精神源头”也好,“一直被我们忽略了的现代思想的核心”也好,反正它有一再被重提的必要。学者(包括作家、知识分子)都不妨尝试着在自己有限的工作领域中追问这个经验的深处,思想的源头,从当下的“学习”中“学习”理解这种不能为最初的学习对象以及最终的学习目的所囊括的指向我们自身的不断失败又不断学习的经验。这不仅是“占有”我们的思想的历史,也是“占有”我们的思想的现在。这是中国思想应该为自己设立的一个出发点。我们的出发点并不在不断涌来的西方的新思想、新理论、新话语,也不在中国和西方某种固有的传统;这个出发点就是不断学习着又不断失败着的我们自己的存在。

二、“人文精神讨论”与“阿Q主义”

20世纪80年代的“人文精神”，到1994年“人文精神讨论”，算是最后一搏了。本来，80年代的中国文坛和学术思想界就是在“五四”以来“不成熟”的人道主义根基上孕育起来的，我在一篇讨论中国现代无神论起源的文章《谁为厉阶，孰知之乎？》中，借周作人的话，将这种不成熟的人道主义概括为“人间本位的个人主义”。我们肯定人的欲望、价值、权力，等等，都是以这个“人间本位的个人主义”为地基的，而这个地基并不坚实。

这就说到我对这场“人文精神讨论”的认识了。我被邀请参加这个讨论，处在一个很边缘的状态，主事者有自己的想法，核心就是主体性哲学和人文主义精神，他们认为那就是终极价值，也是中国最缺乏的，所以要呼吁建立、修补、高扬这种哲学思想和文化精神。我当时并未意识到海德格尔哲学和这场讨论之间格格不入，只是本能地感到一些人的“义正词严”似乎有些难言的虚弱，这种虚弱我说不清楚，后来才知道，那就是主体论哲学和人道主义思想本身的虚弱——它的地基一直并不扎实。也是这时候，我感到当代文学批评没法写下去了，我发现我的思想极其混乱而迷惘。我当时还没有把海德格尔思想作为一个态度、一种学习的方法，而只是作为一种外在的“知识”来把握。我很沮丧地发现这个“知识”不能为我所用。既然如此，也就很快把它放在一边，甚至把它遗忘了。

到这场讨论的后期，我的想法才有了一些转变。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出现了一种重提鲁迅的潮流。有意思的是，很多人把鲁迅作为中国现代人文精神的一个高峰，而我的困惑就从这里开始：鲁迅真是这样吗？鲁迅真的如他们所说，给中国现代提供了人文精神不竭的源泉和滋养吗？一些论者越说越不清楚，越说越令我怀疑。1995年，我开始读起鲁迅来了。

最早读杂文,因为在论争中杂文被引用的频率最高,而我也正想从那里寻找答案。起手是读他早期的文言论文,这就大吃一惊:鲁迅根本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个样子!当时的我异常兴奋,1995年到1998年,我几乎完全沉浸在鲁迅的世界里。正好1999年有一个机会去韩国,在教学之余再读鲁迅,周围也不再有那么多的芜杂,这就陆续写了一组关于鲁迅的文章,后来结集为《鲁迅六讲》,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这本书比较仓促,以后还在写,现在也没有完成。我想再写几篇,索性扩展为“九讲”、“十讲”,但后来写的肯定有否定前六讲的内容。

就“六讲”来说,我确实获得了一些个人对鲁迅的看法。关于鲁迅思想,我很钦佩冯雪峰的说法——写“六讲”的时候我最该感谢的是冯雪峰和胡风——他俩有一个类似的很精辟的说法:鲁迅思想并不等于影响了鲁迅的那些思想。比如说,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确是鲁迅思想发展的过程,但鲁迅思想既不等于进化论也不等于阶级论,而是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一个痛苦的不断否定的过程,这个过程惟一值得肯定的地方就是鲁迅始终保持思想的真诚性,不断追问自己。我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现了鲁迅特殊的“心学”,而那源头,就是写《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时发生的“神思新宗”和中国“心学”传统的糅合。

我的具体论述方式,是系统诠释鲁迅著作中所见“心”字的含义。对鲁迅研究来说,这好像解开了一个长久的难题,对我自己来说,则好像在不断地受到外界困扰的“学习”过程中终于有一种可以勉强叫做“自觉”的东西。如何在不断更新的知识系统中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如何在西方学术几乎无法抵抗的优势面前保持自我与现实的积极关联和起码的自信?这是鲁迅的问题,也是鲁迅思想的精髓:既不把西方的东西拿来武装自己,使自己变成西方知识在中国的代言人——这是大部分启蒙思想家通用的策略——也不像鸵鸟一样把西方知识拒之门外,自己虚构一种理论来解释中国,而是敞开西方思想对自己的影响。这种敞开是痛苦的,它对鲁迅固有想法的改变,往往可以用“轰毁”来形容,就是把自己的思想框

架整个否定了。什么是鲁迅的思想？鲁迅的思想，就是敢于不断否定自己的那种“沉思”状态——“沉思”是《摩罗诗力说》最后一个概念，说一位久处恒寒之地的少年听一个老者讲樱花和黄鸟的故事，该少年从没见过樱花和黄鸟，他于是只好“沉思”。鲁迅说，“然则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这种孤立无援的“沉思”，不也就像《过客》里那个不知道来路也不知道去向的过客执意的行走吗？这样的沉思者和行走者，所拥有的只是失败的经验而已。如果他连这失败的经验也不屑一顾，就真的“空空如也”了。我想鲁迅在他的挣扎中所能得到的“自觉”，大概也就仅限于此罢。

但这样的“自觉”是要付出代价的，即必须抛弃很多虚幻，包括自尊和体面，包括起码的“成就感”。中国学者恰恰太爱自尊和体面，典型的阿Q；他们在“人文精神讨论”中实际扮演了救世主形象，扮演了知识传播者、真理传授者、道德拯救者、文化塑造者的形象。我觉得这都是错误的。这正是鲁迅所说的“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的作风，而鲁迅自己则是从西方盗火煮自己的肉，看看有什么滋味。这就是我所说的鲁迅的“心学”——古人所谓“反求诸己”的功夫，“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但鲁迅所继承的“心学”传统在现代是被排斥的，因为中国现代是那么一个“急迫的不从容的时代”，民众需要知识分子启蒙，知识分子也大部分自认有资格对民众进行启蒙。那时候重要的是制定行动的方案，每个人都要提出一套乃至许多套方案，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各方面的方案——就像今天的一些“知识分子”那样。谁能提出方案为大家所接受，谁就是风流人物，像鲁迅那样抚摸失败的创伤，想从中领悟什么的思想倾向和思想方法，注定不受欢迎——鲁迅生前和身后受到的主要攻击就是说他在批评别人的时候自己没有拿出一套完整可行的方案。中国当时需要的是不承认失败、不承认无能、永远胜利的阿Q，是神气活现的阿Q式的“英雄”、“志士”、“伪士”、“轻才小慧之徒”，而鲁迅恰恰认为这些“英雄”、“志士”、“伪士”和“轻才小慧之徒”都是伪装的阿Q，他的最著名的“狮

吼”，就是要中国人从这种普遍的阿 Q 精神中走出来。

可以想像，鲁迅和现代思想是怎样对抗着：鲁迅试图承认“失败”，而现代中国思想恰恰急于走出“失败”的阴影，现代中国思想恰恰捡起了鲁迅认为应该马上抛弃的阿 Q 式的反败为胜、永远胜利的那一套。在现代中国——我不知道现在怎样——得意洋洋、神气活现的阿 Q 总受欢迎，而吕纬甫、魏连殳、范爱农那样垂头丧气的失败者，总令人讨厌。

无视失败、逃避失败感的纠缠，翻过来一本正经地提方案、指出路，这种思想的普遍策略，一开始就使现代中国思想偏离了正道，而这几乎是一种难以矫正的传统，所以很自然地在 90 年代初的“失败”中为知识分子所继承。本来，那是一个让知识分子承认“失败”的好机会，却又一次错过了，因为知识分子又一次举起了阿 Q 的旗帜，不仅没有“占有”失败的经验，没有从失败的经验中吸取什么，反而从失败中胜利了：“锵锵，我手执钢鞭将你打！”这就很像阿 Q，刚刚受到侮辱，还没体会到侮辱的滋味，就马上变成了俨然的胜利者，并从胜利者的立场出发指点江山、批评同类。

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带有耻辱性的警醒。1996 年我写了一篇《人文精神讨论之我见》，收入王晓明先生主编的《人文精神寻思录》。那时还没有现在这种自觉，主要是比较低估这场讨论，认为它不过属于中国近现代以来一系列思想论争的延续，并没有超越它们。看了这篇文章，有人说邵元宝原来是人文精神的一个叛徒啊！当时人文精神啊、道德理想主义啊、拒绝投降啊……真的很有市场。中国知识分子在失败中表现得极为亢奋，好像人文精神抓在手里，其他一切都不在话下了。但事实证明，这只是无根的现代人文精神的一个推演，90 年代文化终于宣告了它的彻底失败。可悲的是，很多人至今还没有从这个“失败”中走出来，他们似乎又在那里扮演新的胜利者了。他们永远胜利。

我看今天的文化与文学还是 90 年代不自觉的“失败”的继续。这个“失败”是多方面的，一种是知识分子想介入现实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失败”，对这个“失败”，我很庆幸，因为这是个机会，可以使知识分子回到自